



《书屋》编辑部◎编

又一轮睁眼 看世界

从1840年以来，中国被卷入全球一体化的浪潮，
有眼光的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外围世界，以作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借鉴。
最近的一次便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苏东剧变、
冷战解体后对世界局势的重新思考，
其中包括对美国、苏联、欧盟以及对日本、印度等近邻的新观察。

湖南教育出版社



《书屋》编辑部◎编

新一轮睁眼看世界

从1840年以来，中国被卷入全球一体化的浪潮，
有眼光的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外国世界，以作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借鉴。
最近的一次便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苏东剧变、
冷战解体后对世界局势的重新思考，
其中包括对美国、苏联、欧盟以及对日本、印度等近邻的新观察。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一轮睁眼看世界/《书屋》编辑部编.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 11

(书屋文丛)

ISBN 978-7-5355-7150-2

I. ①又… II. ①书… III. ①国际政治—文集 IV. ①D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7638号

新一轮睁眼看世界

《书屋》编辑部

责任编辑: 胡长明

责任校对: 刘文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网 址: <http://www.hneph.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85486742 QQ 2284117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18×1000 16开 印张: 18.5 字数: 193200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55-7150-2

定价: 40.0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林则徐、魏源等是近代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面对鸦片战争所导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著书介绍域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工业商贸乃至风土人情，前所未有地将外部世界的情形呈现在国人面前。编撰《海国图志》的魏源鲜明地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给传统的“华夷之辩”注入了新的视角和内容，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先进科技提供了理论依据。

尽管顽固保守势力从官方到民间一直非常强大，但继林则徐、魏源开风气之先后，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仍以其敏锐的眼光，密切关注着世界正在或已经发生的一切。洋务运动时期，以郭嵩焘、容闳等为代表的思想家以其在国外的亲身感受，确认西方的强盛不惟在器物，更在于发达的政



教,民气既伸,兼之教育振兴,故能产业兴旺,人才辈出,民族国家也便有了日进无疆、继长继高的活力。他们的见识,是对洋务派“中体西用”框架的突破,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郭嵩焘作为中国首位驻英、法公使,主动卸脱汉官威仪,广泛考察西方的工厂、博物馆和议会,其行为和思想与国内顽固保守势力格格不入,以至回国时遭万人唾骂。其所受到的不公和误解,最典型地反映了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的遭遇。他俨然一位孤独的前行者,身上布满了冷箭和创伤。面对老大帝国的沉腐和僵化,年迈的郭嵩焘惟有徒唤奈何。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又出现以梁启超、孙中山等为代表的“睁眼看世界”的一批人物。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主办《新民丛报》,以“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为号召,广泛宣传和探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学术文化和政治理念,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独步一时。他首次向国民厘清了国家与朝廷的关系,以及西方政党政治的运作方式和制度优势,并提出“新民”主张,认为有新民才会有新国家。其思想的超前性和冲击力,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提出“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和“五权宪法”等独创观点,并将理论付之于实践,为建立一个自由、繁荣和平等的共和国付出了毕生心血。他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则亡”,成为激励后来者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鲁迅、陈独秀等先进的中国人揭橥“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将近代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民主与专制相对,科学与愚昧不容,而专制和愚昧正是阻碍近代中国前行的两大根源。只有用民主取代专制,用科学扫除愚昧,中华民族才能



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找到复兴之路。胡适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的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才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作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旗手,胡适先生在治学的同时,努力投身社会政治领域的变革,将伸张人权、推进民主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二十世纪是一个事态百变、主义层出不穷的世纪,期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两大阵营的对峙以及苏东巨变。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知识界一方面继承前辈们留下的思想资源,一方面凭借二十世纪世局演变所提供的丰富经验和启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睁眼看世界”。此轮睁眼看世界,无论是其广度、深度都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因为用来思考的材料、获取信息的渠道以及中外交流的频繁都非往日可比了。

二十世纪最震撼中国知识界的事件莫过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苏联究竟是如何由一个庞大政治实体而分裂为十多个国家的,中国知识界占主导倾向的观点是,苏联非失败于外来的压力和渗透,而是斯大林模式存在致命的缺陷。所谓斯大林模式,便是计划经济、文化统制和政治专制的混合。特别是政治专制,不仅造成一个拥有特权的官僚阶层,而且使国家政治生活长期弥漫着一种恐怖与血腥的氛围,包括高层领导人在内的数百万人死于非命,积累下深重的社会仇怨。斯大林去世后,虽然后来的领导人有局部的改革,但都不足以扭转整个国家向压抑、平庸、内耗方向发展的趋势。苏联的解体,并非戈尔巴乔夫等人故作玩火之举,而是长期积累的社会危机到了相当程度所使然。人民不愿再生活在匮乏与恐惧之中。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长期研究欧洲史的专家陈乐民先生认为,欧洲一方面被“边缘化”,一方面又加速了“一体化”的进程。欧盟虽然是主权国家的联盟,但“超国家成分”正在逐步扩大。欧盟的成立和多层次合作,代表了人类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和新希望。虽然欧洲人失去了十八、十九世纪那种呼风唤雨、支配全球事务的能力,但也从此过上了和平、安宁和富庶的生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看不到欧洲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与欧洲的边缘化相对应的,则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愈发凸现。自从十九世纪末美国赶上和超过英、法、德等传统强国后,它保持了一百多年的长盛不衰,即便前不久产生的严重金融危机,也未能动摇其根基。追溯美国强大的原因,中国知识界将其归结为灵敏的纠错机制和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美国的建国先驱们以博大的胸怀和超凡的智慧,在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的时候,同时实现了政治运作上从理念到实践的一场变革。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和国家权力相互制衡的宪政体制,确保了美国社会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

除此之外,在世纪之交,中国知识界对日本、印度等近邻的认识也明显地深化了。这新一轮“睁眼看世界”的成果,必将对中国的改革和崛起产生深远的影响。一句话,新世纪的中国人应当比任何时期更加明于世界大势,更加清楚中国未来的走向是一个全方位现代化的过程,从而也更加自觉地用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丰富和充实自己。

胡长明

2010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风雨话苏联

- 001 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
——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
- 011 革命的良心
- 024 贝利亚的用处
- 031 斯大林的文学情结
- 039 索尔仁尼琴与赫鲁晓夫
——读《索尔仁尼琴——回归故里的流亡者》
- 045 “现在我是谁”？

第二章 纵横谈欧洲

- 049 读《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
- 059 忘记过去注定要重蹈覆辙
- 073 独裁者的性命之忧
- 087 远距离看欧洲

第三章 遥望新大陆

- 097 一部宪法与一个国家
- 118 当代美国的自由派与保守派
- 129 财产权何以如此重要
——从美国权利法案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说开去



- 138 美国教育的精神
149 总统性丑闻与社会公众的反应

第四章 冷眼看近邻

- 157 无月的遥想
165 认真极处是执著
175 哈哈镜中的重重魅影
——对部分日本动漫的一种文化考察
189 居韩零墨
198 喀拉拉邦和底层的宪法权利

第五章 铭记黑暗面

- 213 历史的血痕
220 视野之外的纳粹女性
——读《纳粹女人》
230 穿越历史的悲怆
——吴哥、红色高棉及其他
241 卡廷：一个永恒的历史伤痛

第六章 常怀千岁忧

- 247 自由经济悖论与人类的困境
254 现代性、技术统治与生态政治



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

——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

1935年六七月间，罗曼·罗兰应邀访问苏联，逐日记有日记。作者决定，这一部分日记要五十年之后才可以发表。改题为《莫斯科日记》的中文译本出版于1995年，更是六十年之后了。

五十年。时年六十九岁的作者知道那时自己必定死了，日记中写到的那些交往的人们，大约也全都死了。无论怎样的抑扬褒贬，都不会再刺激谁。这大约是作者决定采取五十年“时效处理”的用心吧。他却没有想到，对于读者来说，五十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六十年，却有个特殊的意义。在这段时间里，世界上发生了多少大事，苏联又发生了多少大事！二次世界大战，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否定了列宁的遗产，叶利钦促成了



苏联的解体。斯大林时代的许多秘密已经为世人所知晓。人们以今天的知识来读这本几十年前的日记,看看其中一些记载和议论,判断和预言,就特别有意思。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在全世界享有崇高声誉的作家,同时又是苏联最热忱的友人。因此,他的访问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会见了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受到高尔基和其他一些作家艺术家的欢迎。日记中,他不止一次为自己受到的热情欢迎表示激动。他对苏联怀着由衷的友好感情。可是他又是一位有观察力的作家,尽管没有安排他同普通公众会面,在苏联的现实中他还是看出了令他难堪的东西。正因为怀着友好的态度,正因为希望它完美,才更觉得这些消极的东西令他难堪吧。

到达莫斯科的第四天,他写下了对建筑物的观感:“莫斯科正在成为平庸的欧洲城市之一。我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的魅力。莫斯科新建房屋的平庸无味使我感到惊讶。较之莫斯科新增的建筑,街上的人群看上去要更有莫斯科特色得多。”

他看到了普通老百姓生活的艰难。“莫斯科的住房问题仍是折磨人的复杂”,“在莫斯科,生活对大学生、教师和小职员来说仍是非常困难的。利季娅·帕夫洛夫娜对玛莎承认,不久前她请玛莎以及另外几个朋友吃的一顿简单而冰冷的早餐就花了她八十六卢布。一块长方形巧克力糖要花二十五至三十卢布。因此,如果你见到高尔基那儿或者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招待会上的挥霍浪费,你就会感到某种不自在”。(7月19日)“在莫斯科,物质生活(工资、食物、住房)依然非常困难;在列宁格勒和苏联其他地区,物质生活大概更折磨人。”(附记)



艰苦的生活还可以忍受,如果同时看到有人凭借特权来享用,那就更不好受了。罗曼·罗兰看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所获得的最高工资,少于有功劳的非党劳动者有望获得的最高工资,可是,不必被这种分配所迷惑,因为它很容易被绕过。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其他特权(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利益”。(附记)

这种特权,他就自己的经历举了一例:“在毗邻莫斯科的四郊,散布着一些在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别墅(也包括高尔基的独家住宅),里面住着领导人及其客人,或者就是受到特别关照的作家。遇到宽阔的铺有卵石或柏油的道路,你问:‘它们通向哪儿?’回答总是:‘通向别墅。’道路沿线站着警察,他们也从树林中暗地里进行观察(谢尔盖在那儿遇见过他们)。在地平线上,可清楚地看到一幢位于树林中的雪白的漂亮疗养院。你问,它供谁使用?回答:‘政府的上层人员。’你问,石油大王祖巴洛夫的坚固的巨大庄园派了什么用途?回答:‘那儿也是高层社会的别墅和休息区。’……但我们也在路上遇到了向我们投来忧郁目光的男子,一个老年妇女向我们显示了一下拳头。”(7月3日)从这男子的目光和老妇的拳头,可以看到沉默的人民对特权者的反感和敌意吧。

如果,特权者对于自己奢靡的生活感到心满意足,倒也罢了。尽管引起一些人艳羡,一些人反感,但社会毕竟有能力供养这人数不多的奢靡者的。问题是他们不以此为满足,吃饱喝足之后还要生出事来,这样造成的破坏就比自己多享用一些更大了。罗曼·罗兰提到的一件事就是农业集体化运动。为了这事,斯大林写过一篇《胜利冲昏头脑》。这是一场怎样



的胜利呢？罗曼·罗兰的日记写道：“在路上，克留奇科夫对我们讲述在1930至1931年期间爆发的重大农民战争中的事件，这次战争与1919至1920年间的国内战争同样残酷。如果外部敌人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则情况可能变得极其严重。尤其在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在乌克兰，农民毁灭了巨大的粮食储备，毁灭了全部收成，他们只能饿死。在高加索，到了残害自己牲畜的地步。反抗是强烈的和狂热的。一些富裕农民听任亲属在极端贫困中死去，却把自己的东西藏起来。在地里挖坑，把粮食藏在那里。”（7月22日）

于是就有了专政的必要。罗曼·罗兰也认为专政是必要的。他说：“精心选择的政党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非党人士或许比敌人更危险，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准确人数。”（附记）也许罗曼·罗兰没有很好掌握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不会采用马列主义的标准提法：无产阶级专政，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也许是他以为说政党对非党人士的专政更符合实际。反正，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专政依然存在，但企图伪装起来（想方设法不让我见到它），并许诺在更自由的新宪法条件下，将变得更温和。我不能谴责专政（只能因为它努力伪装起来而谴责它），因为危险仍存在。”

这里所说的“更自由的新宪法”是指1936年被称为“斯大林宪法”的苏联宪法，它宣称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已基本建成。可是它并没有带来所许诺的“更温和”。大镇压的高潮正是在新宪法颁布后的1937、1938年。

尽管努力把专政伪装起来，想方设法不让罗曼·罗兰见到，但就是从他同人交谈中得到的一些星星点点的材料中，也足以使人感到阴森可怖



了。“每天都有某个熟悉的家庭消失。我的出版者布洛克于二月被捕,被流放到中亚一个小村庄,在那儿他应该教授图画课。除了他的贵族出身,没有任何流放的借口(他是军官的儿子)……玛莎和费定谈论发生在出版者布洛克身上的事情,谈到了他的被捕。而且,所有的人都感到忧伤,因为大家都喜欢布洛克,并已经采取了一些保护他的步骤。他们痛苦和气愤地谈到基洛夫被谋杀后,在列宁格勒肆虐一时的‘行政强制迁出’。一开始来的是莫斯科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它的行动是有节制的。接着,它被明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取代了,后者显示出对地方和人的一无所知,粗暴和放肆地采取行动,旧的嫌疑者名单被找了出来,并立即开始了放肆的强制迁移。布洛克被放逐到乌兹别克的无人过问的角落,被放逐到农村,在那儿他无事可干,没有人需要他。他在绝望中恳求,让某个撒马尔罕的城市作为放逐地点,在那儿他能有所用处。作家们保护他的申诉不久前已被监察委员会驳回,但作家们已被要求再尝试一次。还提到了商人及其他被推翻阶级子女的问题,他们的出身使他们挺不起身。……‘保姆’谈到与‘行政强制迁出’有关的情况:‘哪怕是建造一些集中营,简易住房,让有嫌疑的人住在那儿,等待更全面地审查他们的案件。’但就让他们呆在露天,没有生活设施……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7月7日)

我想帮他们解释一句:并不是存心虐待这些人,让他们在餐风宿露中折磨致死。而仅仅是因为镇压的规模,一时怎么来得及为这成千上万的流放者准备哪怕是简易的住房呢。这规模有多大呢?一次,主持其事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在向罗曼·罗兰“谈到他本人所显示的对囚犯卫生的关心”。作为例证他谈到“莫斯科附近的集中营,那儿关押着二十万囚



犯,但没有一个病例记录在案”。(7月10日)这真是人间奇闻了。一座有二十万自由居民的城市也不可能没有一个病人。亚戈达说的,恐怕只能解释为:囚犯病了,也不承认他是生病了。罗曼·罗兰听了这话,重视的是他不经意说出的数字,日记中在“二十万”之后加了惊叹号(!)。这样的规模当然不能不令人惊了。

亚戈达告诉罗曼·罗兰,“集中营是预定给刑事罪犯用的”。(7月12日)可是一位老太太告诉他:“集中营预定不仅仅给刑事罪犯用。有独立见解的、不善于谨慎地保持沉默的人会消失不见。官方的看法被强加于人。”(7月13日)

把大批囚犯集中起来,“是为了在大型工程(例如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中加以利用”(7月12日),亚戈达这样告诉他。一位这种囚犯劳动的总管还兴致勃勃地对他讲述运河工地上改造罪犯的成绩(7月13日)。罗曼·罗兰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这些谈话,可是并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论是赞颂还是批评。这也许可以理解为他对此有所保留。萧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中说,另一位也很著名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就曾经作文“歌颂成千上万人为之丧生的白海运河的建设”的。这位著名的俄国作曲家还说,“我知道有整整一个旅的可敬的俄国笨蛋集体创作了一本赞美白海运河的书。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理由的话,那就是他们今天作为旅游者被带去参观运河,明天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可能在那里挖烂泥”。运河的赞颂者中也有高尔基。他的一篇《关于真实的教育》就是赞美运河的。瞿秋白译成中文,见所译《高尔基论文选集》,现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五卷。罗曼·罗兰的日记中提及了运河工程,可是没有加入赞美诗的唱诗班,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刚才说到萧斯塔科维奇，他可是罗曼·罗兰在苏联没有见到的文化界名人。爱好音乐并有甚深造诣的罗兰，为什么没有同这位作曲家见面呢？日记中说：“有传闻说，萧斯塔科维奇拒绝来我这儿，因为我是‘共产党员’。也许，这是谣言。但是，我不怀疑，大部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对很多东西都不赞同”（7月19日）。他分析得很对，萧斯塔科维奇拒绝会见，确实是因为“对很多东西都不赞同”。萧的回忆录中坦率地写下了他对一些来访者的反感：“正是这个萧伯纳从苏联回去后宣布：‘俄国在闹饥荒？胡说，我在哪里也没有吃得像在莫斯科那么好。’当时千百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农民饿死。”回忆录还提到德国作家利翁·费希特万格，他的访苏游记，是斯大林命令大量印行的。可是萧斯塔科维奇说，“我看了感到恶心……要写出这种文章来仅仅是笨蛋还不够，必须还是一个无赖”。这位苏联作曲家对苏联的情况了解得太多，对于唱赞歌的游客自然就反感了。“罗曼·罗兰怎么样呢？——萧斯塔科维奇说，——我想起他就感到不舒服。由于这些著名的人道主义者中间有些人赞扬我的音乐，我特别感到厌恶。一个是萧伯纳，还有罗曼·罗兰。他确实喜欢《马克白思夫人》（注：萧斯塔科维奇创作的歌剧），我本应该去会见这位属于爱好真实的文学和真正的音乐的光辉巨星群的著名的人道主义者。可是我没去，我说我病了。”罗兰的日记表明，他是知道他为什么拒绝会见的原因的。他大体上了解苏联知识分子的情绪，甚至那位临时安排给他的保健医师，“我在他身上觉察了隐蔽的反对派立场”（6月27日），从他给自己诊病时的表现看出了“苏联医生的不得不小心翼翼已到了何种程度”（7月6日）。

斯大林拿出了一小时又四十分钟同罗曼·罗兰长谈。罗兰提出：苏联



的一些行为很难向外国公众解释,因而使西方许多同情者感到疑惑。作为持同情态度的知识分子也应该帮苏联作些解释,但罗曼·罗兰表示,“我们不能胜任这样的任务。”在向别人作解释之先,得说服自己。有些事情要说服自己也并不容易。例如,他就向斯大林提出这样一件事:“不久前,在你们国家颁布了关于惩处自十二岁起的儿童的法律……儿童面临死刑的威胁。”斯大林向他说明了这一项立法的动机:“必须使人畏惧。我们应该通过这项镇压性的法律,以死刑威吓自十二岁起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者。事实上我们没有运用这项法律。但愿将来也不会运用它。当然,我们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将会失去必需的效果,恫吓的效果。不过,已下达了不公开的命令,只是严厉追究怂恿儿童犯罪的成年人。对他们我们将毫不留情……”(6月28日)。

斯大林说的,是为了“使人畏惧”,为了“恫吓的效果”,是真话。只是他没有说,是为了恫吓谁,要使谁畏惧。总不是为了恫吓自十二岁起的“儿童罪犯”吧?不知《苏联大百科全书》是否收了斯大林所创造的“儿童罪犯”一词?这个问题,在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倒是说清楚了。这一位过去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后来改名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干部,写了一本回忆录,中译本书名是《震惊世界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斯大林肃反秘史》,他说:“要摧垮受审者的意志,恫吓显然比许诺更为有效……怎么能够相信斯大林竟会指控十至十二岁的儿童去进行阴谋要推翻苏联政府呢?……报纸上还描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叫沃洛佳的十岁男孩,由于受了长达一整夜的审讯,便承认自己在三年的时间中参加了一个法西斯组织。原告方面的证人之一在法庭上作证说:……当我们就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问孩子们时,他们回答说:‘我们在关押我们